



#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时空回响

# 岁月如歌,传承信仰力量

时空为证,岁月如歌,之江大地上那些不曾忘却的抗战记忆再次涌来;从宁波工程学院学子为224位浙江籍女英烈描绘不朽群像,到烈士亲人手捧烽火家书追溯父辈投身民族存亡的壮烈篇章;从“相机纸笔做刀枪”的无畏、“在战火中把苦难写成诗”的豪迈,到“把父亲的故事继续讲下去”的薪火相传……先辈以生命守护的信仰,正化作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。山河无恙,如您所愿;盛世长歌,由我辈谱写。

■ 本报记者 王璐怡

四年前,宁波工程学院国际交流学院的一群女大学生自发组成团队,寻找浙江籍女英烈。她们没想过,这一找,便是两年;更不曾想到,这场追寻,至今仍在以新的方式延续,成为一场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。

“胜利的时候,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。”曾有烈士临终前这样写道。如今,一群年轻人用行动作出回应:我们不会忘记。历史,永远不会忘记。

## 寻找“浙江刘胡兰”

故事的最初,是从“刘胡兰”开始的。2021年,在国际交流学院一次微课活动中,会计学(中外合作办学)专业大一学生郭宸伊第一次听到“浙东刘胡兰”李敏的故事。作为山西人,她从小熟知刘胡兰的事迹,在异乡听到故乡英雄的名字,倍感亲切。

课后她主动检索,发现浙江还有“浙西南刘胡兰”潘香凤、“浙南刘胡兰”郑明德……她们都是谁?背后有怎样的故事?在辅导员李玉娟的鼓励下,郭宸伊与同学组建团队,开启了对浙江籍女英烈的系统寻访。

仅整理浙江籍女英烈的名录,就耗费了半年时间。与此同时,团队成员发现,要认识理解这些女英烈,光看书、看资料远远不够。于是,团队又走进英烈的家乡、故居、牺牲地,辗转联系上烈士后人、党史研究人员等,想要离她们更近一些。

郑明德,人称“浙南刘胡兰”,1925年生于平阳县凤林村。受家庭影响,她自幼参加革命,15岁成为浙南游击队骨干。1941年不幸被捕,面对酷刑坚贞不屈,被杀害时年仅17岁。

尽管早已通过网络了解她的事迹,但真正走进郑明德纪念馆,看到那张全家福时,团队成员仍深受震撼。照片里,



浙江籍女英烈事迹被编成了舞蹈,团队主要成员参与进行展演。

受访者供图

郑明德梳着齐耳短发,圆圆的脸上笑意盈盈,眼神清澈而坚毅。

“这不就是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女孩嘛!”团队成员陈柔怡是温州人,感受更亲切。随着走访深入,大家发现,郑明德的确就像身边的邻家女孩一样:她爱憎分明,有些“爱哭”,听到方志敏同志为革命事业被残害时,会哭起来;她很有想法,搞义卖活动、办妇女识字班,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;她还喜欢唱歌,入党开心时唱,在牢狱中也唱。但正是这样一个邻家女孩,后来落到敌人手中,遭遇坐老虎凳、被灌辣椒水这些非人的刑罚,但没有一丝害怕和退缩。

“她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名字,而是一个真实、勇敢、有血有肉的同乡姐姐。”陈柔怡说。

## 顶天立地的英雄

在平湖东湖景区,一尊高两米多的铜像静静矗立,她头戴军帽,身穿军大衣,目光安详望向前方。她是女烈士施奇。

说起施奇,郭宸伊就会泪目。1922年,施奇出生在平湖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。淞沪会战爆发后,她主动加入中国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,冒着炮火抢救伤员。不久后,她加入新四军,因工作出色被调到机要科工作,奋战在抗日第一线。

1941年,施奇被捕。她遭受敌人酷刑折磨,身患重病却始终不屈服,最终被敌人活埋致死,年仅20岁。

“她才20岁啊!”想到施奇的牺牲,

郭宸伊特别难受,她说,“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,她们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。”

两年来,团队足迹遍布浙江11个设区市,寻访到224位浙江籍女英烈,累计采访烈士后人、纪念馆工作人员、党史专家、游客等超千人。

团队坦言也面临过艰难时刻——资料琐碎难以整合、部分英烈信息缺失、学业压力与调研冲突,有成员一度想过放弃。

转折发生在一次次与英烈“面对面”的时刻。当读到施奇在狱中身体溃烂仍鼓励战友要坚持斗争时;当看到17岁的杨静娟被拔指甲,死前发出那句振聋发聩的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时;当怀有身孕的张小娇被敌人逮捕仍高呼“命有两条,红军在哪里我不知道”时,团队成员觉得,自己所遇到的困难“不值一提”。

“她们连生死都可以跨越,我们还有什么跨不过的困难?”女英烈们身上所展现出的坚韧、勇敢与信仰,如暗夜中的灯火,照亮了团队成员前行的路。她们重新梳理思路,分工协作,利用假期继续寻访,最终完成了224位女英烈的事迹整理,并形成《浙江籍女烈士名录》。

孕的张小娇被敌人逮捕仍高呼“命有两条,红军在哪里我不知道”时,团队成员觉得,自己所遇到的困难“不值一提”。

“她们连生死都可以跨越,我们还有什么跨不过的困难?”女英烈们身上所展现出的坚韧、勇敢与信仰,如暗夜中的灯火,照亮了团队成员前行的路。她们重新梳理思路,分工协作,利用假期继续寻访,最终完成了224位女英烈的事迹整理,并形成《浙江籍女烈士名录》。

## 让更多人记住她们

224位女英烈,牺牲时最小的只有9岁,最长的60岁,平均年龄仅25.8岁。如何让更多人记住她们?

## 大舅以相机纸笔做刀枪

【讲述人:项碧英 抗战记忆:一台相机】



项碧英(左)在雷烨故居收到北京服装学院团队修复的雷烨老照片。共享联盟·金华 洪兵 摄

■ 本报记者 叶梦婷  
共享联盟·金东 楚千会

“我大舅是个抗战摄影师,他以相机纸笔做刀枪,在抗战一线拍下许多经典照片,记录了民族的苦难与抗争。可留给我们家人的照片,却寥寥无几。”走进项碧英家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墙老照片,其中最显眼的三张合影里,都有同一张年轻的面孔。

这位年轻人叫项俊文,但也许,大家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——雷烨。

这些年,项碧英一次次踏上雷烨生活和战斗过的土地,看着大舅曾用镜头“凝望”的破碎山河变得山川秀美、村落安宁,她忍不住一次次按下快门,记录新变化: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新后村,祖屋修葺一新,成为雷烨故居向公众开放;河北省平山县南段峪村,雷烨牺牲地修建了“雷烨烈士纪念碑”,碑身面向西南朝着故乡金华;平山县还建起了雷烨希望小学……“大舅留存的唯一一封家书,是勉励弟弟妹妹努力求学,他如果能听到雷烨希望小学传出的琅琅读书声,一定很欣慰。”项碧英含泪说。

镜头穿越时光,记录过去与现在,也见证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锦绣山河。

雷烨出生在金东区后项村,他思想进步,爱好文学。1938年,雷烨奔赴延安,途中购买了那台伴他走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相机。从此,镜头成为他抗战的独特武器。

到延安后,雷烨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,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因擅长写作和摄影,他马上崭露头角,开始以“雷

烨”“雷华”“朱靖”等笔名发表作品。“这是1938年9月1日的新华日报,《抗大同学毕业上前线》这篇报道的署名就是‘雷烨’,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现场照片。”项碧英轻抚着一份旧报复印件说。

1938年年底,从抗大毕业后,雷烨拿起相机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“他以相机纸笔做刀枪,记录下潘家峪惨案等日军侵华暴行。”项碧英翻开雷烨作品集,里面收录了雷烨有据可查的约60幅摄影作品,镜头中的八路军战士个个精神饱满、士气高昂。

1943年4月20日,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、组织科科长的雷烨,在河北平山县遭遇日寇包围。为了转移群众,他错失撤退脱险的最佳时机,砸碎珍爱的相机后,用最后一颗子弹壮烈殉国,年仅29岁。

“雷烨牺牲后的近60年时光,他的墓碑上始终没有身份信息,我们也苦寻不到大舅。”项碧英哽咽道。

“大舅拍了无数照片,我们找回他,关键证据也是照片。”项碧英指着墙上三张合影说,第一张照片是雷烨去延安前带弟弟妹妹拍的合影,还叮嘱一定要好好保存;第二张是1938年底他带领前线记者团抵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的合影;第三张是1942年底雷烨到晋察冀抗敌报社采风的合影。

这三张照片原本散落三地,经过雷烨家人和战友多年坚持不懈地寻找,直到2001年才得以“聚首”。以此作为关键证据,大家才确认雷烨就是项俊文,项碧英终于和大舅完成跨越时空的“重逢”。

## 我要把父亲的故事继续讲下去

【讲述人:张红宇 抗战记忆:一叠手稿】

■ 本报记者 李茸  
见习记者 徐佳雨  
通讯员 郭园园 姚欣

我的父亲张连振是一名新四军战士,当年他奔赴抗日前线时,还不到14周岁,比你们大不了几岁。”嘉兴市南湖区新嘉街道的一家红色展馆内,67岁的张红宇老人正面向一群求知的小学生讲述着父亲的故事,讲到动情处,几度哽咽。

在父亲革命故事的熏陶下成长,张红宇退休后加入嘉兴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,走访调研、公益宣讲,将传承红色精神视为自己晚年的重要使命。

在张红宇家中,珍藏着一件父亲生前穿过的军装——墨绿色的呢料依旧笔挺,上面别着十几枚斑驳的奖章。张红宇轻轻抚摸它们,如数家珍:“这是‘独立自由奖章’,上面延安宝塔山和红星的图案清晰可见,是颁给抗战有功人员的;这几枚,是抗战胜利纪念章……”

桌上摆放着一张老照片:白发苍苍的张连振身着挂满奖章的军装,眉宇间威严依旧。张红宇回忆,父亲生前每逢重要场合,总会提前许久认真整理军装,将每一枚奖章细心擦亮、端正佩戴,“对他而言,‘革命战士’这个身份,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1928年,张连振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。1942年,目睹日军在家乡

的暴行,他毅然加入新四军,先后担任游击连战士、卫生员、通讯员,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等炮火洗礼。

比奖章和照片更珍贵的,是张连振留下的一叠厚逾30厘米的手稿,

这是他多年来写下的约50万字的回忆录,

作文纸、信笺、白纸都有,这些密密麻麻的字迹将人瞬间带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。

其中一个故事,发生在1945年。

时任通讯班长的张连振在一次深夜送信途中,意外遭遇溃散的日伪军。他机智地借助夜色虚张声势,最终单枪匹马俘虏多人。

“为什么当时不躲,反而主动迎上去?”这不仅是记者的疑问,也是张红宇最初听父亲讲述时的不解。答

案静静地记录在父亲发黄的手稿上,

字字铿锵:见了不制服,他们就会继续欺压百姓,不知有多少百姓又会遭

遇不测。

张连振将这段传奇作为一篇回忆录的标题,字里行间仍可见当年的决绝与勇气。2016年,张连振病逝。

临别时,张红宇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:手稿即将出版成书。“我要把父亲的故事继续讲下去。”她说,“要让更多年轻人知道,那种百折不挠、向死而生的精神,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精神动力,这也是我作为新四军后代,对父亲最好的纪念。”

“乐亚成的部分家书。”

## 小妹在战火中把苦难写成诗

【讲述人:胡汝谦 抗战记忆:五封家书】



通讯员 徐建钢 摄

乐亚成从前线寄回的家书。烽火连天、老屋几经火灾,这些薄薄的纸页却完好留存。“字迹依然清晰,就像昨天刚写完。”胡汝谦难掩激动,他说这是“奇迹”,是乐亚成小妹隔着时空给家里报平安。

泛黄的纸页上,墨迹深浅不一,可每一笔都写满深情。“床不像床,屋不像屋……”胡汝谦说,乐亚成当年也是这么睡过的。只要腿脚利索,烈士乐亚成的远房亲戚胡汝谦总会来这儿走走,年轻时他常在这乐家小院里听乐亚成的二哥乐时宣讲述小妹的故事。轻抚着那道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门槛,胡汝谦声音放得很轻:“乐亚成昂首跨出家门的时候,才16岁,花儿一样的年纪……可这一走,就再也没有回来。”

1939年,那时的乐亚成还是个会追着兄长撒娇的小姑娘,却在听说新四军的故事后,坚定地要随兄去皖南。仅仅一年后,因表现突出光荣入党;四年后,她调任太滆地区专员公署,任财经分局会计科副科长。

“不管三七二十一,我服从了组织的分配,到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去……”面对陌生的地名、从未接触过的工作,乐亚成在给家人的信中为自己打气。信念如炬,少女的闯劲仿佛能穿透纸背。

写完这封信不到20天,噩耗猝然传来。因叛徒出卖,掌握着新四军财政机密的乐亚成不幸被捕。敌人烧红的烙铁、冰冷的铁链,都没能让她吐出半个字。最终,染血的利斧落下。那年,乐亚成才20岁。

2020年底,胡汝谦的儿子胡牧在乐家老屋整理物品时,意外发现了5封乐



张红宇(右二)给小学生讲述父亲张连振的抗日故事。

通讯员 吴雪渔 摄